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
李涛 任佳 主编

新平县各民族的 生态知识调查

XINPINGXIAN GEMINZU DE
SHENGTAI ZHISHI DIAOCHA

主编 郭家骥 李永祥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新平县各民族的 生态知识调查

主 编 郭家骥 李永祥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平县各民族的生态知识调查 / 郭家骥, 李永祥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068 - 3659 - 3

I. ①新… II. ①郭… ②李… III. ①人类生态学—调查研究—新平县
IV. ①Q9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7959 号

新平县各民族的生态知识调查

郭家骥 李永祥 主编

责任编辑 赵丽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嘉玮伟业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6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3659 - 3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

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 涛 任 佳

副 主 任：杨福泉 边明社 王文成 杨正权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成 王清华 孔建勋 边明社

任 佳 任仕暄 毕先弟 李 涛

李向春 李晓玲 杜 娟 纳文汇

张战边 杨 炼 杨正权 杨福泉

林洪根 陈利君 郑宝华 郑晓云

姚天祥 秦 伟 康云海 黄小军

郭家骥 萧霁虹 董 棣 樊 坚

执行编辑：郑晓云 李向春 马 勇 袁春生

前 言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是人类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自然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的世纪，严重的生态危机促使人类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逐步形成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此同时，随着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环境社会学和环境史学等新兴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全球各地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迄今仍然存活许多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适应、与当代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知识，这些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知识，便构成各民族的生态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反过来说，“一方人也适应、利用和养护一方水土”。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源远流长、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很早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这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文化理念；而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云南各民族，也早就在水土养人 and 人适应、利用和养护水土这一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各具地方与民族特色的生态智慧、生态知识和生态文化。

云南是一个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三多一体”的省份。云南在洪荒时代就自然形成的生态环境多样性，孕育形成了云南的生物多样性；而在生态环境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交互作用下形成的适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多样化环境，又使云南成为我国迄今所知较早的古人类发祥地和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和开发利用多样化的生物资源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实践中，创造了与生态环境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相互适应、良性互动以致高度融合的民族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一经形成，各民族人民便应用人类及其文化特有的理性、智慧和创造力，对生态环境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不断进行文化调适，经过漫长的互动磨合后逐渐形成并保持了“三多一体”、良性互动、高度融合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最晚形成的民族多样性处于核心位置，对于维持这一格局的良性互动还是恶性循环，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民族文化体系中的生态文化亦即各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知识发挥出来的。因此，深入调查挖掘云南各民族的生态知识，既能为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建设提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又能为云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是云南山区多民族地区的一个缩

影，全县 28 万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70% 以上，彝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汉族等多民族在这里大分散、小聚居、交错杂居。各民族在适应山区、半山区、坝区、热区、河谷地区等不同的生态环境和开发利用不同的生物资源以求得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生态文化，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知识。对新平县各民族的生态知识进行人类学个案调查与研究，是为全面调查挖掘云南各民族的生态知识所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越多，越扎实，为云南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决策咨询建议就会越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生态人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也就会更加宽广和坚实。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能为此起到增砖添瓦的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一、生态人类学与传统生态知识	(1)
二、现代化和发展与环境关系中的传统生态知识	(8)
三、新平县各民族生态知识的田野调查地点和方法论	(17)
四、本书的结构和特点	(27)
五、小结	(36)
第一章 水塘镇波村彝族(腊鲁人)的森林知识	(38)
第一节 波村概况	(38)
第二节 彝族(腊鲁人)的森林知识	(41)
第三节 变迁与评价	(57)
第四节 结论	(64)
第二章 漠沙镇曼勒村花腰傣的祭竜仪式	(66)
第一节 文献回顾和选题意义	(66)
第二节 曼勒村的花腰傣	(80)
第三节 曼勒村花腰傣的祭竜仪式	(90)
第四节 祭竜仪式的功能和意义	(102)

第三章 平掌乡库独木村拉祜族（苦聪人）的生态文化	(111)
第一节 库独木村概况	(111)
第二节 拉祜族（苦聪人）的传统生态文化	(122)
第三节 环境资源变迁及其问题与思考	(161)
第四章 者竜乡大竹箐村汉族的生态知识	(172)
第一节 社区概况	(172)
第二节 传统生态文化	(174)
第三节 生产方式和资源利用管理的历史变迁	(187)
第四节 当代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190)
第五节 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209)
第五章 戛洒镇竹园村彝族（尼苏人）咪卡哈仪式的 环境适应象征	(213)
第一节 咪卡哈仪式描述	(213)
第二节 咪卡哈仪式的象征意义	(237)
第三节 咪卡哈仪式中的诸神崇拜	(254)
第四节 咪卡哈仪式的目的	(265)
第五节 结论	(269)
后 记	(270)

导论：环境适应与各民族的生态知识

一、生态人类学与传统生态知识

生态人类学（也称为环境人类学）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探索是人类行为、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和应用。生态人类学产生以后，就向两个方向发展，首先是植根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的进化生态学，其次是用历史理论来解释生态标志的历史生态学。在经典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环境和生态被用来解释文化的起源和变化，并出现了三种观点：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和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前两者在探索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时，认为人类与环境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不相容。而后者则认为环境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

生态人类学经过发展之后，出现了与 60 年代不一致的强调社会变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出现的，其源头是对纯生态系统研究的反省起步的。为了与 60 年代的生态人类学相区别，人们习惯上将 60 年代的生态人类学称为“旧生态人类学”（Old Ecological Anthro-

pology), 而将后来出现的带有新的观点和方法的生态人类学称为“新生态人类学”(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新旧生态学的区别包括政策和有价值的环境知识、应用、分析部件、范围和方法。旧生态人类学认为当地人管理他们的资源和保护传承他们的生态系统做了合理的工作。但是, 那些研究, 基于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标准, 通常对准的是价值公平。学者们认为, 旧生态人类学忽视了“人类—环境相互关系的政治衡量尺度”。^① 相反, 新生态人类学或者环境人类学将理论、政治意识和政策的分析混合在一起。^② 于是, 新的分支学科产生了, 如应用生态人类学和政治生态学。在后来的发展中, 有的学者也倾向于将新生态人类学称之为环境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早期可以追溯到斯图尔德 (Julian Steward)、怀特 (Leslie White)、默多克 (George Peter Murdock) 等人, 斯图尔德和怀特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他们强调的是文化变迁中的技术——环境方法, 或者称为文化唯物主义。斯图尔德考察的是文化在具体的环境适应过程中的作用, 而怀特则更加重视文化的普通进化理论。与斯图尔德和怀特相比, 默多克的兴趣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分析, 他显然受到比较人类学方法的影响。^③ 生态人类学后来的发展出现了重要的研究者, 那就是后来的生态唯物主义, 代表人物包括了 Morton H. Fried、Marvin Harris、Roy A. Rappaport 等人, 他们着重考察环境与人口之间的平衡关系,

① 参见 Vayda, Andrew P. and Bradley B. Walters. 1999. Against Political Ecology. *Human Ecology*, Vol. 27, No. 1: 167—177.

② 参见 Kottak, Conrad P. 1999. “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1, No. 1: 23—35.

③ 参见 McGee, R. Jon and Richard L. Warms. 1996.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P. 221.

即文化是一种保持能量生产、使用和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模式。^① 随着学科的发展，生态人类学又取得了突出的贡献，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包括象征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使得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性别、后殖民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发展成为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并存的当代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最初的理论基点就是生态知识或者传统生态知识，换言之，生态知识或者传统生态知识在生态人类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笔者看来，“生态知识”（Ecological Knowledge，即 EK）也称为“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即 TEK）是生态人类学（后来也称为环境人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生态人类学中广泛使用。但是，在人类学的领域中，传统知识、生态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地方性知识、本土知识、原住民知识、当地知识等的使用是多种并存的，不同的学者喜欢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这些术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笔者看来，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生态知识是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在 Geertz 那里，传统知识和传统生态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从语义上看，传统知识或者地方性知识具有相同至少是相似的含义。地方性知识指的就是当地人的传统知识，而当地人的传统知识又常常来源于一个具体的地方或者民族。因此，在很多地方，传统知识、地方性知识、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生态知识都存在着相互混用的情况。即使在传统生态知识相关的术语范围之中也存在这类似的情况，如传统生态知识（TEK，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也被称为“传统环境知识”（TEK，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传统生态知识和传统环境知识的首写

^① 参见 McGee, R. Jon and Richard L. Warms. 1996.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P. 267.

字母缩写词都是 TEK,但是,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意义。此外,传统生态知识有时还被称之为“原住民知识”(IK, Indigenous Knowledge,)、“当地环境知识”(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等。^①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原住民知识在学术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在很多学者那里,原住民知识包括了农业、健康、食品供给、教育、自然资源管理等。^② 因此,原住民知识理所当然与传统生态知识具有相似的含义。当然,我们有必要清楚地对这些术语进行界定,以便在探讨生态知识在人类适应环境过程以及人类学中的解释。

对于很多生态人类学家来说,生态知识或者传统生态知识是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什么是传统知识和传统生态知识呢?我们在探讨传统生态知识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弄清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及其它它们之间的关系。所谓传统知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秘书处使用了以下“传统知识”概念,“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③ 这是全球范围内对于传统知识的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在中国学界,一些学者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传统知识是“传统部族在其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知识、技术、诀窍的综合,一般具有‘圣

① 参见 Hunn, Eugene. 1999. “The Value of Subsisten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In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edited by Virginia D. Nazarea, Tucson,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② 参见 Agrawal, Arun. 1995. “Dismantling the Divide Between Indigenou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26, 413—439.

③ 参见 http://www.sipo.gov.cn/sipo/ztxx/yczyhctzsbh/csk/200503/t20050322_70311.htm.

境’性、‘经验’性、‘整体’性、与环境要素的兼容性、另类的科学性及其描述形式等特征。”^① 传统知识的研究和使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当今社会各界主要考虑的是各民族的传统知识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商人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保护各民族的传统知识，防止未经许可的使用，很多国际组织积极加入到这一行列中，签订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世界原著民权利宣言》、《国际原著民第二个十年规划》等，并将其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产权保护和原著民权力的重要体现之一。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突尼斯示范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安第斯组织《知识产权共同规范》，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都对于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作了规定，目的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表达和遗传资源权利。在我国，《著作权法》、《种子法》、《商标法》、《民间文学保护条例》（文化部）、以及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等都涉及到了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和传统知识保护问题。

丰富的传统知识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因此，与生物多样性相似，文化多样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第2条将“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常简写为“biodiversity”）定义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知识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是很明显的，没有丰富的生态知识就很难出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换言之，生物种类及知识是

① 严永和：《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各民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环境适应有很多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之上。文化多样性一般是指在特定地区或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多种人类文化和文化表现形式。是指“社会群体和团体的文化以多种形式得以表现。从文化随时空采取的多种形式衍生出民族和社会的独特性、标识和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这些民族和社会构成了人类……。”^① 文化多样性是智慧的源泉和创新的源泉。因此，很多学者那里，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要保护文化多样性。

传统生态知识是保护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条件。那么什么是传统生态知识呢？它对于人类社会为什么是重要的呢？在传统生态知识的定义中，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生态人类学家 Eugene Hunn 教授的定义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传统生态知识是世界范围内与自然资源的传承和生态整体保护有关的具有很高价值的信息资源。传统生态知识系统提供了人类——环境关系的洞察力，而这些洞察力是自然科学没有或者无法提供的。”^② 在 Eugene Hunn 看来，传统生态知识包括着三个重要的特点，首先，传统生态知识是传统的。传统的含义就是在社区中代代传承下来的，而不是在当代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知识一旦与传统有关的话，就说明了这种知识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传统生态知识是生态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数百种动植物及其人类的理解。再次，传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传统的本质不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透镜工具包》中文版（草案），2008 年 1 月。

② 参见 Hunn, Eugene. 1993. "What is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Wisd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ited by Nancy M. Williams and graham Baines. Canberra: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 13—15.

是物质副产品，即它不是工具、艺术产品、也不是服装、仪式歌或者舞蹈。传统是当地环境知识总结，如环境中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土壤和气候、以及具体的地形图。当然，也包括这些知识的价值和信仰及其使用方法。

传统生态知识与科学的关系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讨论，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从文化视野上看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是怎样的；从科学的视野上看，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很多受到过教育的人们，除了那些受到过社会人类学训练的人类学家或者与此相关的学科人员之外，坚信传统文化是非科学的，因为它们建立在幻想的信念之上，或者是因为它们对于西方实验室的观察方法和经验没有益处。但是，如同 Eugene Hunn 教授所指出的一样，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体现出的是西方文化的独特视野，从文化视野上看，它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也没有比别的文化更好。^① 其次，传统生态知识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从科学的视野上看，无论是传统生态还是现代生态学都对于动植物种类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很多非西方的民族对于动植物的分类在 200—800 种之间，^② 而现代生物学对于动植物种类的分类虽然更细，但是，其理论上有着相似之处。并且，各民族对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都有非常详细的理解和运用，他们对于

① 参见 Hunn, Eugene. 1993. "The Ethnobi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Wisd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ited by Nancy M. Williams and graham Baines. Canberra: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 16—20.

② 参见 Hunn, Eugene. 1993. "The Ethnobi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Wisd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ited by Nancy M. Williams and graham Baines. Canberra: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 16—20.

生态环境方面的总结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正因如此，传统生态知识受到了人类学家和一些研究民族动植物及其生态环境学者的关注，也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关注。学术的领域也从最初的人类学、发展社会学、地理等，发展到了生态学、土壤科学、民族医学、林业、人类健康、管理科学、动物学、植物学、农学经济学、乡村社会学、数学、信息科学、水资源管理等。^① 例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设立了民族植物研究室，专门进行与民族植物知识有关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人类学家对于传统生态知识的研究不仅集中在当地人对于动植物的理解之上，还集中在与此有关的信仰和认知系统之上，如神话、传说、仪式等。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会使人们更深刻理解传统生态知识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云南的学者在此方面做出了不错的成就，在今后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多学科的结合具有广阔的前景。

二、现代化和发展与环境关系中的传统生态知识

现代化、发展、环境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今各民族社会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现代化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术语，它用来指一种全球性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的、非工业社会努力去获得‘先进的’工业社会的诸种特质。尽管现代化一般被假设成是一件好事，也确有某些成功之处，但它往往导致一种新的‘不满文化’，希望水准远远超过个人当地的机会。有

^① 参见 Agrawal, Arun. 1995. "Dismantling the Divide Between Indigenou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26, 413—439.